

男子作闺音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男子作闺音》是一个普遍却又特异的文学命题。在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文本中，“女性”之特定身份与地位，经由诸种性别的置换与移情，成为文人士大夫展现情感、志意、怀抱的符号或媒介。幽人怀抱，别有寄托，借口代言之诸般表达手法，所造就的远非单纯的审美效应，更是跨越了修辞、政治、性别、身份的复杂文化呈现。此种抒情策略不仅揭示了文人士大夫之现实身份的层叠与复杂，还昭示着中国诗学传统深潜婉转的话语指向。

张晓梅 著

Nanzi Zuo
Guiyin

人民出版社

Nanzi Zuo
Guiyin

张晓梅
著

男子作闺音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张晓梅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01-006949-4

I. 男… II. 张… III. 古典文学-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615 号

男子作闺音

NANZI ZUO GUIYIN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张晓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6949-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晓梅的博士论文经过一年多的增删、润色、升华，终于就要付梓了，作为她的导师，我此时的心情颇近于二十多年前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时的兴奋与激动。

记得八年前，晓梅选听我给研究生开的“文化诗学专题”课，在课堂讨论时她很喜欢发言，而且每发言必援引唐诗宋词，令我颇觉有趣，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年后我指导硕士论文，我以为她虽是一个对文学颇有感觉、想象力丰富、记忆力好的学生，但理论思维能力一定有限，因此对她的论文并不看好。后来初稿拿来，果然条理不甚清晰，并有辞胜于理之弊。于是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嘱其认真考虑，然心下并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两个月后她交来的论文修改稿却令我为之一振：不仅全部领会并吸收了我的建议，而且有些论证超出我的思考范围。于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所谓一点就透，所谓举一反三。结果她的硕士论文不仅顺利通过答辩，而且得到很高评价。在后来，即2003年张晓梅就考到我这里读博士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读博被公认为是一件苦差事。首先，两门必修课是要认认真真上下来的，其中一门由本学科掌门人、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亲自教授。每次三个小时绝不能无故缺席，即使童先生因开会耽误上课，也必定要补回来。另外本学科全体博士生导师联合开设一门“西方文论专题”课，每位老师讲两三次，也是郑重其事，不容丝毫懈怠。其次，博士生刚一入学就要布置给他们10本必读书目，并且在一年后严格考核。考核的方式是：在一间大教室里全体博士生进行笔试，同时在一间小教室里，七八位博导正襟危坐，面前置一椅，坐着一位博士生接受面试。考核内容均出自必读书范围，请学生提

供两本自认为烂熟于心的,由老师们即席翻阅并提出问题。这10本必读书中赫然便有德国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洪汉鼎先生译本)上下两大册。由于该书学理深邃、涉及广泛,历来少有选者,但张晓梅却偏偏要选此书,在回答问题时又能滔滔不绝、一气贯通,毫无窒碍。后来我才知道,这部书她竟读过七遍之多!由此可见张晓梅用功之勤。

“男子作闺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很有普遍性、很重要的现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楚辞》,其余绪则延绵至于现代。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学界却缺乏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张晓梅选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很有见识的,再加上她本人自幼酷爱古典诗词,许多篇什均可诵之于口,也很适合作这样一个题目。毫无疑问她的研究是成功的。她的博士论文在他们这一届二十余位同学中是唯一一篇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一直在探讨被称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其要点是通过梳理各种文化文本的相互关系及相通性来重建文化语境,进而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探讨某种文学观念产生与演变的原因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蕴。晓梅这部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书稿从文化语境、历史语境、社会心理、文人士大夫人格结构等不同角度对“男子作闺音”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所隐含的文化意蕴与人格冲突进行了揭示,其引证之丰富、辨析之精审、视野之开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多年来所探讨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的又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

张晓梅博士是河北沧州人士,虽为女流,却颇有当年燕赵之士的豪迈与果敢。为人聪慧多才,兴趣广泛,不惟擅言辞,更有处理纷繁事务的能力。倘能沉潜内敛、执著向前,并无不可成之功。

李 春 青

2008年2月10日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序	李春青 1
男子作闺音——研究起点与文化诗学视野	1
一、男子作闺音界说	1
二、文化诗学的阐释——症候阅读与审美视野	6
第一章 男子作闺音的内涵及特征	13
第一节 男子作闺音的内涵及特征	14
第二节 男子作闺音的六种类型	24
第三节 男子作闺音的三副面孔	42
第二章 男子作闺音现象的历史考察	77
第一节 先秦:诗经与楚骚	77
第二节 汉魏六朝:代作·拟作·宫体	83
第三节 唐代:闺怨·宫怨·香奁	113
第四节 宋代:俗艳·闲雅·骚雅	127
第五节 元明清:百年香艳未断绝	138
第三章 “双声”话语与政治修辞	149
第一节 寄托之作的历史演绎	149
第二节 男女君臣之喻的文化谱系	157
第三节 说诗·用诗·采诗	190

第四节 “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曹植的“政治失恋”	207
第四章 文本“编织物”与审美修辞	220
第一节 拟作体式的源流正变	225
第二节 审美修辞的组织类型	230
第三节 典型文本的“超级链接”	238
第四节 “善言儿女”与“义多规镜”:傅玄的代作与拟作	267
第五章 特定文体的证例:宋词的切片观察	278
第一节 北宋政治场:右文·劝乐·崇理	281
第二节 士大夫习性:双重角色·双重话语·双重价值	291
第三节 北宋文学场:区隔·趣味·规则	304
第四节 士大夫心理场:双性情感·双重态度	319
第五节 柳永:“未为尧舜用,且向裙钗托”	331
余论 文化的“双性同体”:男扮女装与女越男界	350
参考文献	381
后记	390

男子作闺音——研究起点与 文化诗学视野

一、男子作闺音界说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从中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词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但只要翻检文学史就会发现，“男子作闺音”现象在诗赋创作中同样普遍，且奕代继作、迭见不鲜。这就使其超出了单纯的文体风格的论域，成为中国诗学一个普遍而独特的命题。大略而言，“男子作闺音”这种古代文人代妇女或借妇女立言、立心的书写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言此意即此或若此”，创作主体以模仿历史女性声口或代替现实女性抒发相思离忧，爱恨情仇，意向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女性心理性格特征，内容上则多叙写女性的思慕与怨恚。另一类是“言此意彼”，即所谓的“托志帷房”，“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①。对于“男子作闺音”内涵的理解和厘定，有的学者将之称为“角色诗”^②；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言体^③或是“化妆的抒情”^④；而孟悦、

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

② 参见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0—174页。

③ 参见杨义：《李白代言体诗歌的心理机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

④ 参见杨义：《李白代言体诗歌的心理机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

戴锦华则用“性别错指”^①命名“男子作闺音”现象。国外的汉学界则更多地从性别的角度来关照这种现象:比如张小虹将之称为“性别越界”(gender crossing)^②;孙康宜定义为“性别面具”^③(gender mask)。除此之外,也有人提出“男人说女人话”、“男扮女妆”、“雌声学语”等说法。从以上种种界定我们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现象是一种以文学为主体,跨越政治、性别、身份立场的复杂呈现。

对于古典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男子作闺音现象,对于文人士大夫何以要在诗歌创作中以妾妇自居,又为什么采取此种“迂回”的言说策略,已有学者试图对此作出恰切的阐释。总体说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寄托说”。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以比兴抒情创其始,屈原的“香草美人”扬其波,到汉乐府诗歌,代抒闺怨的作品就渐渐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题材,后来作为一种手法渐渐凝固转化为模式化的比兴思维,男性诗人可以很方便、很熟悉地借思妇的身世和口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遭遇。到了唐宋词人手中,他们更常以男女情爱寄托政治活动中的郁郁不得志。而与之并行的文论史,也形成了以比兴说诗、发挥阐释其微言大义的传统。至于为什么能够形成此种“词近闺房,非言男女”的寄托传统,论者指出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物。认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构成带来了以夫妇关系比附君臣关系的思维定势。他们作为“人臣”的感受与女子在家庭中的感受相似,自然会产生与女性角色的心理认同。特别是当他们政治上无端失宠而成为放臣逐子的时候,自然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闺中怨妇”的地位。所以当士大夫抒写这种悲怨而又忠爱缠绵的政治性情思时,拟托于弃妇贱妾表达对夫主的“忠敬”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文体说”。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词的创作来说的。

① 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见张晓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序言”,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参见[美]孙康宜《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载于《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论者认为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它的审美效应必须靠歌伎的演唱来实现，为了适应这种女音演唱的要求，文人学士便纷纷“男子而作闺音”——直接以女性的身份口吻说话，在词里写女性题材，仿女性腔调，抒儿女柔情，从而使得词的主体风格柔化、女性化，归于艳丽婉转一路，促使男子作闺音的繁荣。在他们看来，唐宋词中存在着大量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的作品，与词最初诞生的酒宴歌席的环境及由女性歌手演唱的形式有密切关系，此种现象的产生实是词体“自律”要求所致。

第三种观点是“同情说”。这种观点是杨义在探讨李白的代言体诗歌时提出的。^① 杨义认为，在古代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不过是男性的陪衬和附庸。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创作的权利，而且彼时女性的爱情生活是很不幸的：或远人长期不归，或郎君薄情背弃，凄楚哀怨、抑郁愁闷是其感情生活的主旋律。命运不幸而又兰心惠质的女性自然会赢得男性的怜爱与同情，进而产生为之代言的创作欲望，模仿其情态抒发柔情哀意。这种创作欲望使他们主动关心女性，设想其处境，主动为之代言。杨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男扮女装”一方面自然出自对思妇、怨妇和弃妇的同情，而另一方面，又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发出了一个被冷落了的声音，宣泄了一种被压抑而郁积着的情感。

第四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双性情感说”。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且多层面、多质素的，每个人身上都存着阳刚、阴柔两种对立的基因，都具有男性和女性双重气质，即“双性人格”。当那些男性诗人文士们在化身为女子的角色而写相思怨别的诗歌时，往往无意间流露出他们自身所隐含的怨妇心态，一种如张惠言所说的“贤人君子幽咽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其引发联想之因素，无论是就文化语码方面而言，或者就感发本质方面而言，原来都是与作者潜意识中的一种‘双性’的朦胧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要言之，此论断言，虽然士大夫们所写的怨妇诗歌是一种“为女性代言”的笔法，实际上他们创作的怨妇诗却往往存在着两个意义系统：一个是字面上的怨妇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

① 参见杨义《李白代言体诗歌的心理机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

②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态的系统；一个是潜在的诗人自身内在情感的凝聚。由于古人对这种“阴阳同体”之特质缺乏明确的认识，对这种文化现象又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只得发些“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不害其为正。然世人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①云云的冠冕堂皇的强辩之词。或者像传统之词学家如常州派者将本无比兴寄托的作品，强指为有心托喻之作。

最后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女权说”。马睿的观点最具代表性。^② 她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线去重新审视此种话语策略。她认为男子作闺音的现象中包含着主流话语对“他者”的排斥和压制。首先是女性在文本中的物化和虚拟性。文本中的抒情主人公虽然是女性，却被迫女扮男装，诉说着男性诗人心中事；文本后的抒情主体分明是男性，却又男扮女装把自己的哀怨不平强加于女性，占据和取代了女性的表达和言说，使得“女性”落入双重假象的罗网：一方面女性的情感经验被父权话语和文本强行纳入合乎规范的模式，疏远了她自己的真实；另一方面这个不真实的文本形象，只不过是仕途坎坷的诗人的替代品，是他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之时唯一可以操纵的傀儡。其次，马睿认为，“女性”话语的看似繁华之处，恰恰呈现出女性表达的荒芜、女性主体的缺失。一方面，男性诗人谙熟于以代言方式创作，并使他们选择的词句、意象和情绪，成为诗歌文本中女性情感的主流和正宗；另一方面，男性诗人以女性形象出场却只顾自言自语，实际上不仅仅是盗用了女性的表达，而且还掩盖了她们没有话语权这一事实。马睿又指出，男子作闺音是父权文本对女性的奴役和铸造。如果说在父权文化的宫廷形态、国家形态中他们是权力的对象，那么在父权文化的家庭形态、民间形态中，他们则是权力的化身。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身居高门的贵族女子，还是栖身青楼的风尘女子，其生活的重心无一例外都是男子，得到男性的爱是她们唯一的希望，是她们生存的唯一意义。然而，正是这样的经典抒情文本，由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无

①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参见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形中就把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文学形象固定为男性的依附者和从属者,以至于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女诗人的创作,也在无法逃避的语言罗网和文学传统中,认同了代言体闺怨诗的模式,以男性言说女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不自觉,认同了父权话语制定的女性假象。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研究者或者拘执于外部的视角,认为是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伦理特征决定了男子作闺音的抒情方式;或者仅着眼于内部的视角,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文学自律的结果。这种研究是我们不能满意的。一方面,文本的产生不是作家和历史语境的“函数”,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定的环境就产生一定的行为,这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持此理解就犯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现象是文学传统自身发展的结果,不考虑外在的语境的作用,这种类似于形式主义或者英美新批评的满足于文本和文学自足的方式显然也是狭隘的。同时,忽视或放弃对创作主体的创作动因及创作心理的考量,也必然使得对男子作闺音现象的阐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认为,就男子作闺音现象而言,只有从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审美心态、创作行为入手,将文本、作者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考察才会更具考察与解剖的效力。而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说”恰恰暗合了我们的思考。

作为一名杰出的反思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同样是杰出的。他同时对文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进行发难:一种是所谓内部研究,即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和自足性,强调文学规则的超历史、超社会、超民族、超道德的普遍价值;另一种是所谓的外部研究,即强调文学赖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如意识形态、社会成规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方法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一种虚假的对立:内缘研究忽视了文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语境,而文学外部论者又忽视了文学的相对自主性。基于这一考虑,布迪厄认为,要想保有上述两派各自的片面的真理,同时又避免其真理的片面,有必要走第三条道路:他以独特的关系思维的模式,“与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相决裂,引导人们运用一些关系性来赋予某一要素的特征,这些关系性将此一要素与系统中所有其他要素加以联系,并且,通过这些关系性,此一要素才能获得其意义与功能”^①正

① Boundieu, p., *The logic of praetice*, standford: standfond university, 1990.

是在此问题视域下他提出了“场域”(field)概念。对于布迪厄来说,文学场的隐喻不仅仅是对于文学与历史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更是洞悉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作者的文学观点与创作轨迹、文学的发展与变革动力的重要视角。文学场可以在内、外视角两方面调和上述内部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说:“在总体上来说,意味着大多数文学策略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一石两鸟:其效果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①

虽然布迪厄理论的法国性造成了它跨文化语境转换的有限性,但是,布迪厄直接从文本和创作行为入手,来考察个体行动者(作者)和世界(历史语境、场域规则)的关系。他将作者视为文学场中的“行动者”,种种社会制约因素塑造了作者的“习性”(习性强调的是客观环境的机遇和限制与行为者的倾向和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详见后文)。他既反对一味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也反对单纯用外部结构来解释行动者的实践。他的这些理论思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理论“天窗”,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的烛照下显露出被遮蔽的诸多面向,而展示出新的意义维度。

二、文化诗学的阐释——症候阅读与审美视野

(一)文化诗学

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将文学研究方法区分为外缘研究与内部研究两类。前者包括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等研究;后者则集中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分析和解释(一度在文学研究舞台上出尽风头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文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都属此类)。当文学的内缘研究倾心于将文本放在理论的手术台上进行“学术与技术的断片”解剖时,也终于在使尽解数后,将自己的研究生命推向了穷途末路。于是,文化诗学(culture poetics)在这样的困境中“粉墨登场”,并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努力方向。

^① 引自朱国华《当代文论语境中的布迪厄》,《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为格林布拉特。他强调将历史意识的恢复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强调在历史意识、历史语境中解读文化文本或文化语码的现实意义,历史视野和文化审视使这一流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被引进到中国后,被业内学者作了中国化的吸收、转换和改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先生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和业师李春青先生提出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童先生认为文化诗学大体而言可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维度:对内的维度——文学的文化意义的考察,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整个文化;对外的维度——文学与其他文体样式的相互影响的考察,即把文学置身于文化这一更大的系统中去考察。而李先生的文化诗学主张强调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重建文化语境;二是尊重研究对象固有的互文关系;三是将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三个研究层面连为一体。这些研究方法的开拓、提炼和总结使国内的文学研究“柳暗花明”。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和盲点,理论的思考永远不可能还原出历史经验的全部,不同的理论会导引研究者发现不同的研究领域,提出不同的问题。同时,任何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有效范围,也必定会在某些领域显示出它的无能为力。因此,我们不认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它作为对于已经僵化的旧的研究范式的阶段性反思,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是,文化诗学所开拓的宽泛的研究视野以及对于研究对象的适用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思路的实践价值。

文化诗学的研究视野首先承认诗学问题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共生的,对于诗学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诗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不是某一先验的、固定的理论或者简单的概念的规定,而应该是那些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所有具有诗意性或诗学价值的文本。这就是说,文化诗学是一种诗学,这种研究思路不仅扩大了诗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丰富了诗学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一种研究视野中,那些长期以来不被认为是文学或者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具有了研究的价值与关注的必要。

(二) 症候阅读

文化诗学展示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宏阔的研究视野,就其研究的实践而言,

还需要对文本的独特而敏感的认识与阅读思路。“没有一种阅读不包含着(至少是含蓄地)决定阅读性质的一种理论。”^①我们认为,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症候阅读”法是在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下应该采取的阅读策略。

“症候阅读”也被译为“征候读法”,这是阿尔都塞在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提出的一种新的阅读方法。今村仁司对征候式阅读的解释简练精粹。他说:“语言有空虚的时候,这空虚的场所就叫做‘征候’。读懂这征候就是征候性解读。这种读法,使语言表层的连续性解体,或者是被朝两个方向撕开的语言状态表面化,从而诊断并解读空无和空虚的征候。”^②阿尔都塞的征候式阅读法将阅读方式分为无辜的阅读和有罪的阅读。无辜的阅读也叫清白的阅读,是指日常生活层面的那种理想化的直接阅读。这种阅读方法和有罪的阅读(症候阅读)是相对立的。直接阅读是一种惯性阅读,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想当然的阅读,由于对支配直接阅读的理论问题体系缺乏必要的反思,这种固定化的、概念化的理论体系视角局限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所以直接阅读会使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新的对象和问题在现存理论领域内必然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不是这一理论的对象,因为它们是被理论拒绝的东西,因而必然是与这个总问题所规定的看得见的领域没有必然联系的对象和问题。”^③这些被忽视的对象和问题在旧有的理论问题体系中只有在某种征候条件下才会以沉默、空缺、不在场的方式流露,有如看似一个正常的人的精神分裂症候在特定场合的流露一样。同理,对于文本而言,“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的公开的语言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种声音在说话,而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④。因此,症候阅读就是要通过转换问题体系,从而找出被压抑的沉默、空缺、不在场的症候,揭

① [英]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3页。

②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示新的现象和问题机制。阿尔都塞写道：“所谓征候读法（symptomatic）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①读懂其他隐藏在表层的言说下面的言说是症候性解读，它给予被隐藏的言说以生命，并进行重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男子作闺音现象，我们同样要进行的是一种双重阅读，换句话说，我们要阅读另一种阅读。

（三）审美视野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论研究追崇和使用的是理论舶来品。它以毫不谦逊的霸道姿态统治着文学研究领域几十年。而今，质疑的声音日益强烈。那么，古代文论研究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研究态度呢？

为论述方便，这里，我们暂且将古代文论的研究态度“粗暴地”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民族”模式，另一种是“科学”模式。

持第一种态度的研究者不反思古代文论印象式、点悟式的理论把握方式、零散而不系统的存在样式以及中国文论这个“潜体系”具有的概念含混不清、逻辑分析不够、体系化程度不高的缺点，而一味自说自话、以古解古、故步自封的态度自然是不可取的。^③因为文学理论毕竟是理论，它必须将文学审美活动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辨层次。在多元文化倡导的今天，在“现有文化基础上去选择、汲取异质文化中合乎需要的因素正是当下中国学人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无法推却的任务，除非他放弃言说的权利”^④。因此，借鉴西方理论，对古代诗学作整体的、宏观的审辨，“从本土文化中去筛选、把握其中最富于生命力的东西，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去激发其中的理论因子”^⑤，使其由原来的潜在形式变成直接形式是文论自身获得发展的必经之途。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② 参见[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③ 叶朗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

④ 李春青：《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困惑及可能的对策》，《三峡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⑤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47页。

第二种研究态度的合法性“来自于言说者自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精神”^①,认为“穷众口之辩”,建立一个一劳永逸、雄视百代的理论大厦是文论研究的最高诉求。他们企图同时扮演“学术显微镜”和“理论望远镜”的角色,使其构建的宏大体系既能对绵长的古代文论传统作尽览无遗的鸟瞰,又能概括文论话语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但是,希图将古代文论这样的“精神流传物”中的诗性、体验、感悟等成分剔除干净,将研究对象化约为按照一定规则而形成的编码系统,绝对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如果我们是以对于规律性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的实质。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②“凡是在效果历史被天真的方法论信仰所否认的地方,其结果就只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歪曲变形了的认识。”^③

而今,纵使西方的理论家们也意识到了,纯粹的理论化、技术化的批评是不必然具有批评效度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体系多么宏大精密,而是在于它所揭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可能靠着艺术品服从于逻辑规则来理解艺术品。一本诗学教科书不可能教会我们如何写一首好诗。因为艺术来自于更深的源泉。”^④另一方面,也不存在绝对的、权威的、永恒的体系。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敢断言说它“真确地涵盖了那川流不息、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所有的理论都受到文化、历史的一定限制”^⑤。应该说,对古代文论作出逻辑的、系统的、有现代意识的体系化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古代文学思想是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文学的价值象征着人的价值,对文学的体认就是古人对自身精神状态的体验。因此,体系应该是建立在关注体验基础上的体系;体验也应该是在体系条贯下的体验,“一相情愿去拜倒在细分的解剖的西洋思维方式的裙下是会伤及我们美感领域及生活风范

① 李春青:《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②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④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⑤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74页。